
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社会互动与融合研究

——基于浙江省嘉兴与义乌两市的比较研究

姜亦炜

(湖州师范学院人文社科处, 浙江湖州 313000)

【摘要】从社会互动与社会融合出发, 基于复杂性与典型性的考量, 选取穆斯林世居地嘉兴与新兴穆斯林聚居地义乌两市进行比较研究。研究过程中构建一套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社会互动与融合的测量指标, 包括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度与本地居民的接纳度。随后从经济整合、行为适应、身份认同与文化心理融合等方面对两地进行比较。提出值得注意的问题有: 文化心理融合的累进效应, 当地人的安全感, 宗教与组织的作用, 穆斯林流动人口本身的功利化倾向与媒体的污名化, 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独特性与新问题, 维吾尔族亚群体的社会互动内卷化倾向, 民族养老、安全监控、商家阿语招牌等问题。提出进一步促进互动与融合的意见: 加强党的领导, 提升组织保障与人员配备; 从教派识另倒伊斯兰的中国化; 从优惠政策到公共服务均等化; 对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的冷思考等。

【关键词】穆斯林流动人口 社会互动 社会融合

【中图分类号】C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7X(2018)02-0077-15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本文有两个核心概念社会互动与社会融合, 一般认为一个人的身份识别、认同产生于社会交往与互动中, 通过区分“自我”与“他者”形成个人与个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共性与区隔。人们对互动与融合的理解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见解: 一方认为多元社会需要“高墙造就好邻里”; 另一方认为“彼此融合”才能解决族群问题。

“社会融合”最早的研究是伴随着“社会排斥”概念出现的。并渐次成为欧洲福利政策的焦点之一, 进而广泛成为研究者与政策制定者的重要决策依据。但是排斥仅代表了外界的影响, 而未考虑自身的对社会的认同、尊严和满足, 故此具有更大包容力的社会融合概念应运而生。它不仅是一种被动的适应, 更是一种试图影响过程的动态努力, 有主观能动性。“社会融合”的研究从观念层面, 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并形成了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阶段, 社会排斥论——基于社会参与的视角。第二阶段, 移民融入论——基于市民化的视角。该视角从人口社会学中的人口流动方面来界定社会融入, 主要集中在讨论

【作者简介】姜亦炜, 湖州师范学院人文社科处讲师。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社规划一般项目“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研究——基于浙江省的调查”(17NDJC087YB)、民委民族研究项目“东部地区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社会互动与融合研究”(2017-GMD-007)阶段成果。

移民社会适应及农民市民化问题。第三阶段，社会融合论——基于社会公平的视角。它所强调的是一种状态和目标，融合是双向的，表示流入地与流出地文化的交融。

除了观念层面的建树，学界对族群社会融合指标体系与方法论建构也做了有益的尝试。最早的建构见于西方学界对吉普赛人的研究，根据其“内部成员”与“外族成员”态度、观念甚至行为规范上的差别建立了十方面的比较体系，并分析了吉普赛人与其他族群的心理距离和社会鸿沟。后来的学者从多角度建构了同化的维度与变量，戈登将融合概括为七个变量：文化或行为的同化，社会结构的同化，婚姻的同化，身份认同的同化，公共事务的同化，族群间歧视行为的消除，意识中族群偏见的消除。英格尔为了能够系统的分析影响族群成员族群意识强化或弱化的因素，以美国为背景提出了一组（14 个指标）可以比较的变量。分离指数、通婚指数、同化指数则是从不同角度对于融合的指标考量。中国学者也曾对融合指标做过归纳，如体质因素、族群宽容度、人口因素等十五种指标。

鉴于早期学者对指标体系建设的重视，后期学者更关注如何获得高质量的样本，以得出准确结论。由于像族群、农民工等群体的高流动性，严格的随机抽样难度太大，许多学者会在调查中采取偶遇、滚雪球、配额和判断等非随机抽样方式。但是有学者对这种抽样方式提出质疑，风笑天、朱磊等人对近十年比较有代表性的流动人口抽样调查进行了分析，发现要获取一个完整的抽样框非常困难。

最近几年关于少数民族社会融合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类：第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状态的描述性研究。第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制约因素研究。第三，推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政策研究。也有政府官员认为要弱化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而更多强调中华民族的一致性，身份证中应取消民族一栏。

纵观近几年学界对于城市社会融合问题的持续关注，取得了丰硕成果，特别是在一些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特殊移民群体，农民工、少数民族等，更是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兴趣。^①但是还是有一些方面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第一，融合指标体系建设方面，已有海量的“社会融合”的定量分析研究，但究竟采取怎么样的指标体系进行衡量，众说纷纭，现有的几种指标都存在变量过多的风险。第二，在研究方法选择上的困扰，以往在对流动人口进行问卷调查的过程中往往采用街头拦访、“滚雪球”、判断抽样等非概率抽样方法，无法建立一个完整的抽样框。第三，在时间与空间的选择上，未形成比较研究的优势。社会互动与融合应该也有自己的发展脉络，它会因社会变迁而发生重大变化，可能需要 3 年、5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比较，如同英格尔哈特跨时间的政治文化研究所得出的“价值现代际变迁”的结论，社会互动与融合也需要进行跨年度比较研究。

二、研究方法：被访者驱动抽样与深度访谈

（一）被访者驱动抽样

在流动人口的抽样调查中，抽样框是困扰研究者的一大问题，以往街头拦访、“滚雪球”、判断抽样等都无法解决抽样框

^①这方面的研究可参见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和城乡融合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1 年第 3 期。李培林：《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 年版。杨菊华《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5 年第 2 期。刘传江：《中国第二代农民工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黄进：《价值冲突与精神皈依——社会转型时期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研究》，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马戎：《我国部分少数民族就业人口的职业结构变迁与跨地域流动》，《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11 期。葛壮：《长三角都市流动穆斯林与伊斯兰教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 年版。张鹏：《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的重构》，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

的完整性。另一方面研究者作为一名非穆斯林，与流动穆斯林在文化和心理上存在着一定的距离，而笔者又是以研究者的身份去接触流动穆斯林的，这些因素都可能会对问卷、访谈效果产生影响。鉴于此，本课题组一方面选取了四位穆斯林研究者参与其中，另一方面将采用种子抽样法，即“被访者驱动抽样”（RDS）来进行调查，希望在取样时克服可能存在的困难。

根据前述方法得到的评估指标体系设计问卷，对嘉兴、义乌两市穆斯林的社会融合进行调查，抽样方案拟按照种子抽样法，即被访者驱动抽样进行，每个城市选取2~3位穆斯林做种子，选种子时考虑行业、城市区位因素，种子记为第0批被访者，再每个种子推荐2~3个自己熟悉的穆斯林，作为第一批被访者，后续招募以此类推，至少保持后续链条4层以上，每个受调查者记录一个RDS卡片，包括编号与推荐人关系。本次研究计划每个城市样本规模150人。

（二）深度访谈

本研究将充分利用深度访谈法以弥补问卷调查的不足，根据前期探索性访谈及可行性分析将主要集中在清真饮食行业（拉面馆、牛肉馆）以及商贸业（城市商业贸易从业人员）为主，目前初步的访谈对象包括拉面馆（10人）、小商品城从业人员（10人）、清真餐馆（2人），大学清真食堂（2人），另外除了流动穆斯林以外，本研究还将选取六市清真寺的阿訇及伊斯兰教协会工作人员各2位，本地人若干进行访谈，以便从宗教机构、政府和本地人三个角度了解东部地区流动穆斯林的社会融合情况。选取两组穆斯林流动人口典型代表，对其日常生活进行考察。将以描写“生活”的方式，以一种“流动者的使徒传记”的形式，获取研究资料，为微观层面描述穆斯林的社会互动提供素材。

三、研究对象：选取嘉兴与义乌两市的考量

之所以选择嘉兴与义乌两市，是基于中国历史的独特性、中国现代社会的巨变性和中国底层社会的复杂性的考量，正如应星教授在论述质性研究方法时所说，美国人追求定量研究，是因为美国社会的均质性，而中国社会高度的反均质性，呼唤的却是一种质性研究的回归。^①在这个重定量研究的时代，一个研究的科学性在于取样的准确性与代表性，浙江省穆斯林的互动融合应该是全省所有县市区的按比例抽样，但是面对从梁启超始称之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社会，巨变就始终未停歇过，面对这样的巨变，以严格的抽样程序为代表性的定量研究就显得有点力不从心，而质性研究讲究的复杂性，就体现出了其应有的价值。之所以选择嘉兴与义乌两地，就是考虑到其复杂性与典型性，故而以此二者，窥一斑而知全豹。

（一）嘉兴：穆斯林世居地

嘉兴市作为穆斯林世居地，其典型性与复杂性在于流动穆斯林在嘉兴的互动与融合，不单包含与本地人的关系，还涉及与世居穆斯林的关系，其演变和发展更体现了一种时代性与历史纵深感。其典型性代表了一批如杭州、宁波等有世居穆斯林的城市。嘉兴自宋元时期已是番舶骈集，回回众多，又由于教门好，有口皆碑，被誉为“江南小麦加”，市内的清真寺是浙北唯一的一座清真寺，建于明朝万历三十年，距今近四百年。可以说嘉兴是穆斯林的世居之地，并有久远传统。也正因为此，浙北地区流动穆斯林初来浙江第一站往往选择先到嘉兴，或者居于别处，也会选择到嘉兴清真寺走访拜会阿訇。

由于北方与杭州往返，朔运河上下，一定途径嘉兴，宋代就有番舶往来，元代则更有发展，所谓“商贾贾凑”，到了明代，角里街人烟物资鹿集，倍于城中。^②成为了穆斯林的集聚地，明万历三十年（1602），“今教人马仲律等而各量力捐金，买得隙地，于治东之通济桥南，稍仿杭制启建”^③清真寺（真教寺），从此嘉兴成为该地区穆斯林活动的中心。但是在随后的太平天国运动、各地回民起义之后，穆斯林人口骤减，而今居住在嘉兴的穆斯林，大部分是民国时期从河南、山东等地逃荒而南迁的穷困农民，而且多以卖艺为生，这也为现今嘉兴很多回民武馆，埋下了伏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嘉兴回民主要以大饼油条、屠宰牛羊业为主。1952年曾有一次回民普查，嘉兴有回族480人，主要居住在狮子汇一带，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次统计，嘉兴有回族324户，1142人。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嘉兴市有少数民族人口 15.86 万人，其中常住人口 1.56 万人，流动人口 14.3 万人。涉及 54 个民族（仅裕固族、珞巴族未在嘉兴居住）。其中在嘉兴市辖区有世居的本地回族群众 3000 余人，加上信仰伊斯兰教的 10 个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穆斯林人口共计约 1 万余人。^④

表 1 嘉兴市穆斯林流动人口基本状况（调查样本）

变量	构成	比例	变量	构成	比例
男	83	61.76%	收入状况		
女	52	38.24%	1000-2000	18	12.20%
年龄			2000-3000	33	24.39%
10-20	15	11.43%	3000-4000	52	39.02%
20-30	73	54.29%	4000-5000	26	19.51%
30-40	39	28.57%	5000-6000	3	2.44%
40-50	8	5.71%	6000-7000	3	2.44%
文化程度			职业状况		
小学	11	8.57%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	0	0.00%
初中	42	31.43%	专业技术人员	14	5.00%
高中及中专	35	25.71%	办事人员	0	0.00%
大专	15	11.43%	个体工商户	20	15.00%
本科	8	5.71%	商业服务业人员	101	75.00%
研究生	4	2.86%	产业人员	7	5.00%
识字	8	5.71%	农业劳动者	0	0.00%
文盲	12	8.57%	无固定职业者	0	0.00%

本次问卷调查中共采样嘉兴市穆斯林流动人口 150 份，有效问卷 146 份，调查样本中，女性 52 人，占比 38.24%，男性 83 人，占比 61.76%，男性比例高于女性。1980~1990 年出生的流动人口所占比例最高，平均年龄为 25~26 岁。受教育程度以初、高中居多，占比 56%。从职业状况来看，商业服务业人员占比最高，达到 75%，其次为个体工商户与专业技术人员。其他具体情况见表 1。

本次问卷调查中共采样嘉兴市本地人口 150 份，有效问卷 141 份，调查样本中，女性 69 人，占比 48.78%，男性 72 人，占比 46.34%，男性比例高于女性。1980~1990 年出生的本地人口所占比例最高，平均年龄为 30~31 岁。受教育程度以大学本科居多，占比 37.84%，其次为专科，占比 27.03%。从职业状况来看，专业技术人员占比最高，达到 43.33%，其次为产业工人，占比 23.33%。

① 应星：《质性研究的方法论再反思》，《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4 期。

② 陆志鸿等：《嘉兴新志（上编）》，1929 年刊本，成文社 1970 年影印本。

③ 马化龙：嘉兴府建真教寺碑记，万历三十年，碑现存嘉兴清真寺。

④ 数据来自嘉兴市民宗局 2016 年的统计结果。

其他具体情况见表 2。

表 2 嘉兴本地人基本状况（调查样本）

变量	构成	比例	变量	构成	比例
性别比			文盲	0	0.00%
男	72	46.34%			
女	69	48.78%	收入状况		
年龄			2000—3000	48	34.78%
20—30	60	39.47%	3000—4000	37	26.09%
31—40	30	21.05%	4000—5000	31	21.74%
41—50	22	17.79%	5000 以上	25	17.39%
61—70	22	15.79%	职业状况		
71—80	0	0.00%			
81—90	7	5.26%			
文化程度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或经理 人员或私营企业主	29	20.00%
小学	0	0.00%	专业技术人员	61	43.33%
初中	19	13.51%	办事人员	0	0.00%
高中及中专	27	18.92%	个体工商户	0	0.00%
大专	38	27.03%	商业服务业人员	9	6.67%
本科	53	37.84%	产业工人	33	23.33%
研究生	0	0.00%	农业劳动者	0	0.00%
识字	4	2.70%	无固定职业者	9	6.67%

（二）义乌：新兴穆斯林聚居地义乌作为穆斯林的非世居地，其典型性与复杂性在于，虽为县级市，并由金华代管，却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国际商贸城和移民之城，^①并成为全省非常重要的一个穆斯林人口流入地，流动的穆斯林不单要面对本地居民还要面对来自中东、南亚、北非的外籍穆斯林。其典型性代表了一批如绍兴柯桥、杭州萧山、嘉兴桐乡等因商贸业而聚集起大批穆斯林的城市。义乌古称乌伤，并非传统的穆斯林聚居地，根据义乌县历年的回族人口统计，1953 年 2 人，1964 年 11 人，1982 年 11 人，1989 年 19 人。可以说是一个没有清真寺、没有集中的伊斯兰宗教活动地、也没有穆斯林墓地的三无地区。但是截至 2017 年 6 月，义乌市已有少数民族人口近 13 万，涉及少数民族成份 53 个，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达 12.65 万人（约占全市流动人口总量的 10%），^②而这其中有穆斯林人口 14572 人（未包括国外穆斯林），主要来自于宁夏、青海、新疆、河南、甘肃，每周五的主麻日有将近万人在义乌大清真寺做礼拜，义乌已然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穆斯林集聚地。

在与一位义乌的出租车司机聊天过程中，我们发现伊斯兰文化因素已在此地留下了深刻印记，并且与当地的经济文化生活

① 依据义乌政府门户网站提供的有关 2016 年城市人口统计数据，其外来人口是本地人口的 1.7 倍。

② 数据来自义乌市市民宗局 2017 年的统计结果。

融为一体。他说“斋月到了，市场就冷清了，打的的生意都淡了，银行都不用排队，很多酒家白天都不营业了。开斋节一到市场才又红火起来”。可以说义乌的商贸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融合已经成为义乌这座城市的显著标志。

表 3 义乌市穆斯林流动人口基本状况（调查样本）

变量	构成	比例	变量	构成	比例
性别比			文盲	0	0.00%
男	99	83.90%			
女	21	17.80%	收入状况		
年龄			0--10000	39	32.50%
20-30	22	18.33%	10001--20000	39	32.50%
31-40	43	35.83%	20001--30000	42	35.00%
41-50	54	45.00%	30000 以上	0	0.00%
51-60	1	0.83%	职业状况		
文化程度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或经理 人员或私营企业主	0	0.00%
小学	27	22.50%	专业技术人员	15	12.50%
初中	64	53.55%	办事人员	0	0.00%
高中及中专	27	22.50%	个体工商户	56	46.67%
大专	2	1.67%	商业服务业人员	28	23.33%
本科	0	0.00%	产业工人	21	17.50%
研究生	0	0.00%	农业劳动者	0	0.00%
识字	0	0.00%	无固定职业者	0	0.00%

本次问卷调查中共采样义乌市穆斯林流动人口 150 份，有效问卷 120 份，调查样本中，女性 21 人，占比 17.8%，男性 99 人，占比 83.90%，男性比例高于女性。1970~1980 年出生的流动人口所占比例最高，平均年龄为 39~40 岁。受教育程度以初、高中居多，占比 75%。从职业状况来看，个体工商户占比最高，达到 46.67%，其次为商业服务人员，占比 23.33%，专业技术人员占比 12.5%。其他具体情况见表 3。

表 4 义乌本地人基本状况（调查样本）

变量	构成	比例	变量	构成	比例
性别比			文盲	0	0.00%
男	44	34.48%			
女	85	65.52%	收入状况		
年龄			2000--3000	27	13.79%
10-20	8	6.90%	3000--4000	17	13.79%
21-30	86	65.52%	4000--5000	27	20.69%
31-40	31	24.14%	5000 以上	58	44.83%
41-50	4	3.45%	职业状况		

文化程度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或经理 人员或私营企业主	19	13.79%
小学	0	0.00%	专业技术人员	40	31.03%
初中	5	3.45%	办事人员	0	0.00%
高中及中专	27	20.69%	个体工商户	0	0.00%
大专	53	41.38%	商业服务业人员	44	34.48%
本科	40	31.03%	产业工人	4	3.45%
研究生	4	3.45%	农业劳动者	0	0.00%
识字	0	0.00%	无固定职业者	22	17.24%

本次问卷调查中共采样义乌市本地人口 150 份，有效问卷 129 份，调查样本中，女性 85 人，占比 65.52%，男性 44 人，占比 34.48%，女性比例高于男性。1980～1990 年出生的本地人口所占比例最高，平均年龄为 25～26 岁。受教育程度以专科学历居多，占比 41.38%，其次为本科，占比 31.03%。从职业状况来看，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占比最高，达到 34.48%，其次为专业技术人员，占比 31.03%。其他具体情况见表 4。

四、嘉兴与义乌市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社会互动与融合现状比较

本文采用质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方法，以问卷调查为主，深度访谈为辅的形式开展研究，根据前述的被访者驱动方式抽样了嘉兴市、义乌市穆斯林流动人口各 150 人，嘉兴市、义乌市本地人口各 150 人。在参阅相关文献资料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社会互动与融合的测量指标，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度；另一方面是本地居民的接纳度。

在建构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度时参考了欧洲社会融合度标准化量表、戈登的族群关系指标以及杨菊华教授的社会融合指标体系。主要从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经济整合、行为适应、身份认同与文化整合、心理融合等方面，以及二十个子类进行建构。这个建构考量是基于我们认为社会融合是一个过程——从“由流入而生存，从适应到融合”，所以经济整合度就成了城市融入的关键因素之一，主要包括城市就业、居住、收入、医疗等；其次，是其社会交往、行为适应、文化生活等等，包括各种社区参与、培训学习等，行为举止与生活方式方面的市民化，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化是其主要表现形式；再次是身份认同与文化接纳，主要体现在对原籍地与现居地各自的认同度，以及文化接纳等方面的含义；最后，是其心理融合，主要包括心理认同感和归属感等等

而在本地居民的接纳度上主要建立了一个涉及十一项指标的本地人对穆斯林流动人口的接纳程度量表。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了问卷调查表。

（一）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经济整合度：嘉兴与义乌的比较

对两城市穆斯林流动人口经济整合度的调查显示，其社会融合指标体系方面：经济整合、行为适应、身份认同与文化接纳、心理融合中表现最好(详情对照表 5 至表 8)。^①不管是嘉兴还是义乌，都远高于其它三方面。两个城市绝大多数的穆斯林流动人口都对生活的城市以及浙江省其它城市保持好感，嘉兴的数据有 26%的人感觉非常好；有 46%的人觉得印象不错，但也有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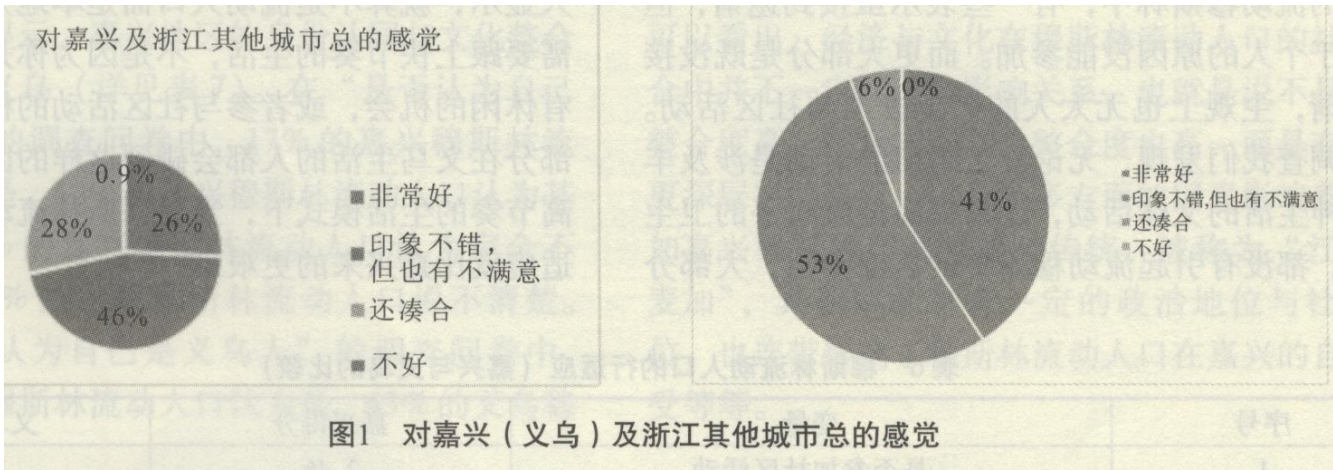
①总体经济整合度数据来自于四项分指标的合计，它们分别是“对嘉兴（义乌）及浙江其他城市总的感觉”，“对现有工作的满意度”，“居住条件及环境”，“看病吃药情况”。

满意；没有人选择感觉不好。同样义乌的数据也显示，有 41%的人感觉非常好；有 53%的人觉得印象不错，但也有不满意；没有人选择感觉不好（详情见图 1）。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美国学者 E. S. Lee 关于人口迁移的“推力—拉力理论”。基于该理论的论述，人口迁移与流动的决定性因素来源于流出地的“推力”和流入地的“拉力”。推力是指流出地的就业不足、耕地不足、生活设施匮乏、自然灾害、发展落后等内在因素；拉力则是指包括流入地就业机会更多、工资更高、良好的发展前景、更好的卫生和教育设施、更好的居住环境等其它因素。^①正是嘉兴、义乌地区普遍的经济优势，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收入及更齐备的教育卫生设施，吸引了大量的穆斯林流入。所以当—一个流动群体进入一个陌生环境时，所做的第—步就是经济生活的立足，这被看成是最基础，也是最显性的一种融合。

进一步分析嘉兴与义乌两个城市的差异，从数据分析看，义乌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经济整合度高于嘉兴（详见表 5）。结合街头访谈与民宗局的走访，大致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方面，义乌这个城市拥有更高的国际化程度，它拥有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更容易就业，更容易获得经济交往的便利，所以经济上更容易整合。据义乌市民宗局统计，义乌现有清真餐厅 300 多家，上规模的就有 50 多家，这在全浙江省都是绝无仅有的，—位商人这样说：请—位中东的朋友吃饭，在杭州找不到—个像样的餐厅，还只得到义乌来招待。另—方面是嘉兴与义乌穆斯林流动人口不同的职业状况造成的。嘉兴穆斯林流动人口主要以商业服务业就业为主，占到调查样本的 75%，其主要的职业是饮食、运输、屠宰、水果批发等，而在义乌的穆斯林流动人口主要以个体工商户为主，占到调查样本的 47%，其主要的职业为外贸、阿拉伯语翻译等。不同的就业岗位造就了不同的社会地位，社会地位同样影响经济整合度。

表 5 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经济整合（嘉兴与义乌的比较）

序号	变量	嘉兴得分	义乌得分
1	对嘉兴（义乌）及浙江其他城市总的感觉	2. 97	3. 35
2	对现有工作的满意度	3. 29	3. 79
3	居住条件及环境	2. 26	2. 85
4	看病吃药情况	3	3. 39
5	总体经济整合度情况	2. 88	3. 35



（二）穆斯林流动人口的行为适应度：嘉兴与义乌的比较

对两城市穆斯林流动人口行为适应度的调查显示，总体上都不是很高，同时在嘉兴与义乌两地呈现出一定的背离性。^②

总体不是很高说明虽然穆斯林流动人口与当地人在城市居住，但是由于其不同的生活轨迹——文化背景、交往圈子、就业领域，从而导致彼此之间的距离感。在访谈中我们发现，有些流动穆斯林租用了当地人的住宅，亦无太多交集，只在收房租时有联系。这说明流动穆斯林并无太大的意愿去构建自己在本地的社会关系网络，主动参加社区活动的意识也不是很高。由于生产生活方式，民族宗教文化的差异，导致穆斯林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明显地被标定为两个群体，他们虽生活在同一个社区内，但是日常生活中的交流交往并不频繁。

背离性则表示流动群体的行为适应过程，是在经济上立足之后发生的，其影响因素更复杂，不单单和流动人口的特征与行为习惯相关，更与流入地的社会生态相联系。调查显示嘉兴穆斯林流动人口的总体行为适应度略高于经济整合度为 2.954，义乌则大大低于经济整合度，为 2.31(详见表 6)。同时与经济整合度义乌高于嘉兴不同，在行为适应度上，嘉兴要高于义乌。特别是在“是否参加社区活动”，“休闲生活的频繁程度”两项指标上，嘉兴的得分远高于义乌。在参加社区活动调查中，嘉兴地区穆斯林流动人口中有 11%的人经常参加，有 29%的人偶尔参加，有 46%的人有机会，但不愿参加，还有 14%的人没有机会参加。义乌地区穆斯林流动人口中有 1%的人偶尔参加，还有 99%的人没有机会参加（详见图 2）。总体来看，穆斯林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活动的机会和主观意愿度都不高，义乌比嘉兴程度更重。再进一步分析那些没参加社区活动的流动穆斯林中，有一些表示虽接到邀请，但是出于个人的原因没能参加。而更大部分是既没接到邀请，主观上也无太大的兴趣去参与社区活动。通过调查我们发现，无论社区组织的活动是涉及丰富精神生活的文体活动，还是提高健康水平的卫生活动，都没有引起流动穆斯林的广泛参与，大部分流动穆斯林表示社区活动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

表 6 穆斯林流动人口的行适应（嘉兴与义乌的比较）

序号	变量	嘉兴得分	义乌得分
1	是否参加社区活动	2.46	1.02
2	休闲生活的频繁程度	2.97	1.53
3	每月休闲消费支出比重	2.71	1.02
4	对于休闲生活的满意度	3.29	3.03
5	与本地居民的交往频度	3.21	2.53
6	与本地居民的交往愿望	3.59	3.49
7	与本地居民的交往数量	2.38	2
8	与来嘉兴（义乌）原籍老乡的关系	2.79	3.44
9	与左邻右舍的关系	3.17	2.98
10	与本地穆斯林的关系	2.97	2.05
11	总体行为适应度情况	2.954	2.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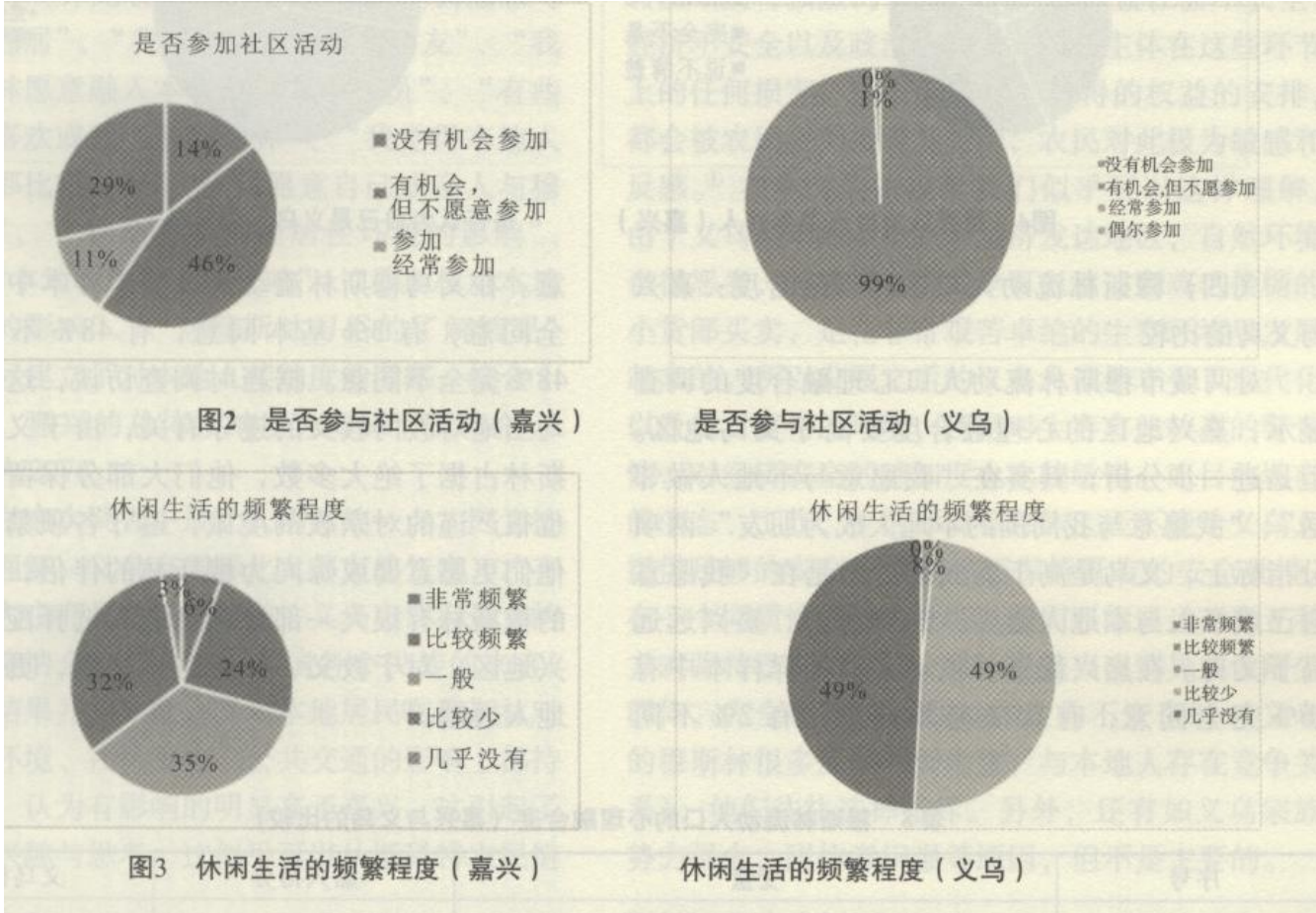
在休闲生活的频繁程度这项指标上，嘉兴地区穆斯林流动人口中有 6%选择非常频繁，有 24%选择比较频繁，有 35%选择一般，

① 郭正涛，张晓颖：《深圳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社会融入与城市管理》，《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6 年第 1 期。

② 总体的行为适应度情况来自于十项分指标的合计，他们分别是“是否参加社区活动”，“休闲生活的频繁程度”，“每月休闲消费支出比重”，“对于休闲生活的满意度”，“与本地居民的交往频度”，“与本地居民的交往愿望”，“与本地居民的交往数量”，“与来嘉兴（义乌）原籍老乡的关系”，“与左邻右舍的关系”，“与本地穆斯林的关系”

有 32%选择比较少,有 3%选择几乎没有。而在义乌地区穆斯林流动人口中没有人选择非常频繁与比较频繁,有 2%的人选择一般,有 49%的人选择比较少,还有 49%的人选择几乎没有(详见图 3)。休闲生活的频度显示一个人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参与到各种社会交往活动中去,是衡量一个群体行为适应上的一个很重要指标。嘉兴地区穆斯林流动人口的数据显示要优于义乌。

嘉兴穆斯林流动人口的行为适应度要高于义乌,初步分析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嘉兴自宋代起就是穆斯林的世居地,穆斯林群体与当地人的交往有一个传承的过程,这也影响到了流动穆斯林群体的的行为适应。当地穆斯林群体从自发到有组织的开展的一系列民俗活动产生了积极效果。如嘉兴海华武校长期举办的“周末我最牛”活动,不仅吸引了大量的本地人参与,同时也向普通群众展示了国遗项目“中国惯牛”的精髓,让普通市民真切的了解到民族文化自身的特色,树立了穆斯林群体的正面形象。戒惧就是在不断的沟通交往中慢慢消除的,它需要一个累进的过程。第二个原因是杭嘉湖地区本来就是一个休闲、安逸的城市,与义乌城市的精神气质上就不一样,据采访义乌本地人显示,就算不是流动人口而是本地人,要生存也需要跟上快节奏的生活,不是因为你是穆斯林而鲜有休闲的机会,或者参与社区活动的机会,而是大部分在义乌生活的人都会碰到这样的困扰。在这样高节奏的生活模式下,当地穆斯林流动人口的行为适应就比嘉兴来的更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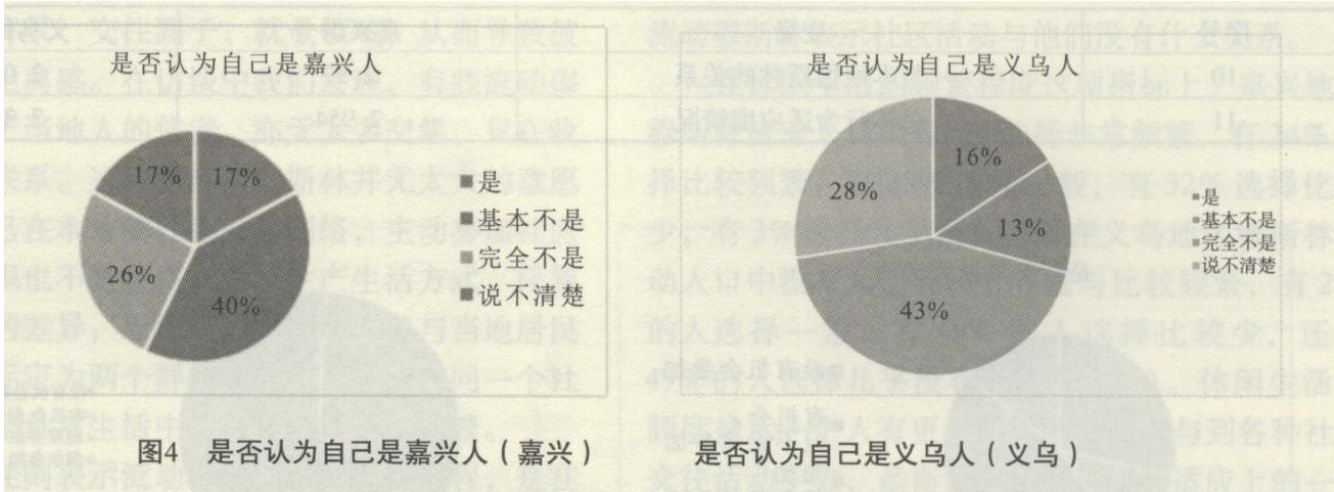
(三) 穆斯林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与文化整合度：嘉兴与义乌的比较

对两城市穆斯林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与文化整合度的调查显示,嘉兴地区的身份认同与文化整合度都要高于义乌(详见表 7)。在“是否认为自己是嘉兴人”的调查问卷中,17%的嘉兴穆斯林流动人口认为是,40%的嘉兴穆斯林流动人口认为基本不是,26%的嘉兴穆斯林流动人口认为完全不是,还有 17%的嘉兴穆斯林流动人口说不清楚。而在“是否认为自己是义乌人”的调查问卷中,16%的义乌穆斯林流动人口认为是,43%的义乌穆斯林流动人口认为基本不是,26%的义乌穆斯林流动人口认为完全不是,

还有 28%的义乌穆斯林流动人口说不清楚（详见图 4）。从这个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出，经济与文化在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中并不一定成正向影响关系，也就是说不是经济整合度高，就意味着文化整合度也高，而是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以及更多方面的因素影响，比如嘉兴穆斯林有其渊源和传统，被称为“江南小麦加”，其穆斯林享有一定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也连带影响了穆斯林流动人口在嘉兴的自我感受等等。

表 7 穆斯林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与文化接纳（嘉兴与义乌的比较）

序号	变量	嘉兴得分	义乌得分
1	是否认为自己是嘉兴（义乌）人	2. 57	2. 18
2	对原籍老家的感情	3. 06	2. 02
3	与原籍老家的联系	2. 72	1. 07
4	子女教育问题	3. 09	3. 02
5	总体身份认同与文化接纳度情况	2. 86	2. 07



（四）穆斯林流动人口的心理融合度：嘉兴与义乌的比较

对两城市穆斯林流动人口心理融合度的调查显示，嘉兴地区的心理融合度要高于义乌地区。但是进一步分析，其实在“我愿意与本地人做邻居”、“我愿意与我周围的本地人成为朋友”两项分指标上，义乌是高于嘉兴的，但是在“我愿意自己或亲人与本地人通婚”的指标上，嘉兴远远高于义乌。在嘉兴穆斯林流动人口抽样样本中有 26%完全同意，有 65%基本同意，有 2%不同意。在义乌穆斯林流动人口抽样样本中没有人完全同意，有 3%基本同意，有 48%不同意，有 48%完全不同意。据当时调查访谈，这可能和义乌当地对教门教义的遵守有关，由于义乌流动穆斯林占据了绝大多数，他们大部分保留了很传统也很严谨的对宗教的虔诚，遵守各项禁忌，所以他们更愿意娶或嫁同为穆斯林的伴侣，所以义乌的穆斯林有很大一部分会在老家选择配偶，而嘉兴地区，对于教义、禁忌略显淡漠，更愿意与当地人的通婚。^①

①姜亦炜：《婚姻中的社会干预——基于“知乎”中关于“中国式逼婚”的访谈调查》，《浙江社会科学》2017 年 11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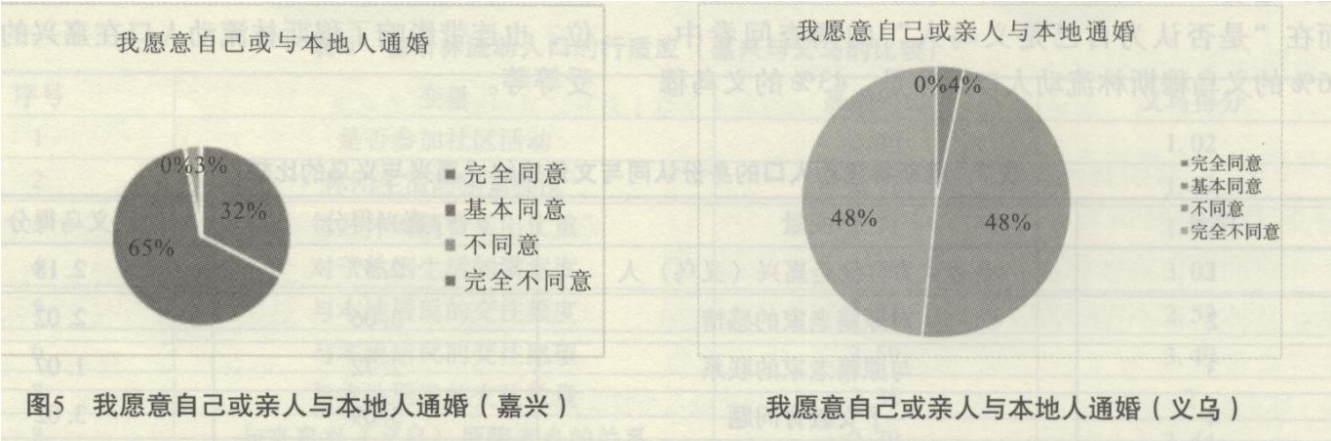


表 8 穆斯林流动人口的心理融合度（嘉兴与义乌的比较）

序号	变量	嘉兴得分	义乌得分
1	我愿意与本地人做邻居	3.44	3.50
2	我愿意与我周围的本地人成为朋友	3.38	3.48
3	我愿意融入社区	3.48	3.47
4	我对目前居住的城市有归属感	3.21	3.01
5	我愿意自己或亲人与本地人通婚	4.67	1.55
6	我觉得本地人愿意接受我成为其中一员	3.15	2.52
7	我觉得本地人不愿与我做邻居	2.65	2.55
8	我感觉本地人看不起/不喜欢穆斯林	2.85	2.55
9	总体心里融合度情况	3.35	2.83

（五）本地人对穆斯林流动人口的接纳程度：嘉兴与义乌比较

对两城市本地人对穆斯林流动人口接纳度的调查显示，嘉兴本地人对穆斯林流动人口的接纳程度要高于义乌（详见表 9）。本次调查以“我愿意与穆斯林做邻居”、“我愿意与穆斯林交朋友”、“我觉得穆斯林愿意融入本地成为其中一员”、“有些本地人不喜欢或看不起穆斯林”、“我觉得本地人对穆斯林都比较友好”、“我愿意自己或亲人与穆斯林通婚”、“穆斯林对本地居住环境的影响”、“穆斯林对本地社区卫生的影响”、“穆斯林对本地公共交通的影响”、“对穆斯林习俗的了解情况”十个分指标建立了对本地人接纳度的考察，综合十项指标后，嘉兴的总体接纳度为 2.98, 义乌的总体接纳度为 2.78。

这是在本次调查中最让人困惑的一点，因为按照一般的理解，义乌有国际化大都市的气度，才有了世界最大小商品市场的美誉，义乌应该有最大的包容度来接纳全世界各地、全国各个民族的来客。但是调查结果并非如此，义乌本地居民在穆斯林对本地居住环境、社区卫生、公共交通的影响上都持保留态度，认为有影响的明显高于嘉兴。这引起了我们极大兴趣与思考。这似乎可以从斯科特农民道义经济学中关于“安全第一”的内容来阐述。虽然他研究的是东南亚稻农的生活，但是其理论阐释还是很值得借鉴。他认为农民往往把规避风险，安全生存作为关键，农民在日常生活中就容易感知到转型不安与强烈的风险感，其中涵盖社会不安全、经济不安全以及政治不安全，任何主体在这些环节上的任何损害，减少农民已经获得的权益的安排，都会被农民视为损害其安全，农民对此极为敏感和反感。^① 在本文的语境里我们似乎可以这样理解，由于义乌本来并不是一个经济

①[美]詹姆斯·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年版。

发达地区，自然环境也很恶劣，其经济发展最早可以追述到鸡毛换糖的小货郎买卖，是在非常艰苦卓绝的生存环境里发展起来的。所以发展之后的义乌人虽然享受了现代化以及相对富裕的环境，还是对生存有比较高的警觉性，对经济安全的感知度也比较敏锐。而目前城市的生态、工作、生活环境等总体上还不能给义乌人提供足够的安全，他们想要保持既有的安全处境。在一个同质性的熟人社区，他们还能通过互惠互利方式弥补已有的不安全感，但是当碰到异质性陌生群体，完全有可能面临整体性的不安全时（义乌的穆斯林很多从事外贸生意，与本地人存在竞争关系），他们往往选择排斥。另外，还有如义乌宗族势力强大，团体意识强等原因，但不是主要的。

表九：本地人对穆斯林流动人口的接纳程度（嘉兴与义乌比较）

序号	变量	嘉兴得分	义乌得分
1	我愿意与穆斯林做邻居	3.39	3.07
2	我愿意与穆斯林交朋友	3.43	2.79
3	我觉得穆斯林愿意融入本地成为其中一员	3.21	3.28
4	有些本地人不喜欢或看不起穆斯林	2.63	2.52
5	我觉得本地人对穆斯林都比较友好	3.20	3.17
6	我愿意自己或亲人与穆斯林通婚	2.66	2.62
7	穆斯林对本地居住环境的影响	3.17	2.83
8	穆斯林对本地社区卫生的影响	3.20	2.86
9	穆斯林对本地公共交通的影响	3.29	3.03
10	对穆斯林习俗的了解情况	1.60	1.62
11	总体接纳度情况	2.98	2.78

五、存在的问题与值得注意的方面

（一）整合之困：经济整合较容易实现，但是穆斯林流动人口的行为适应、身份认同、文化整合与心理融合，则需要长时间的累进效应

结合上述对两城市穆斯林流动人口经济整合、行为适应、身份认同与文化接纳、心理融合四方面的分析，我们应该认识到，经济整合较易实现，但是穆斯林流动人口的行为适应、身份认同、文化整合与心理融合，则需要长时间的累进效应，切不可过分急于求成。费孝通老先生所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就是在维系 56 个处于基层的民族基础上，在更高层次建立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形成一个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过程。不同层次可以并行不悖，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会取代低层次的认同，从而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群体。^①所以在整合穆斯林流动人口与城市融合的过程中，最终达到的是一种“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

（二）辩证统一：在考虑穆斯林流动人口的融合政策时，必须把当地人的接纳度考虑进去，特别是给予当地人安全感

穆斯林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这是一对辩证关系，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需要以当地人的接纳为前提，而当地人想要过一个有安全感的生活又是以穆斯林流动人口的充分融合为前提，故此，在考虑穆斯林流动人口的融合政策时，还应该把给予

①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

当地人更多的安全感考虑进去。只有在城市的生态、工作、生活环境总体上给当地居民以足够的安全，他们才会没有后顾之忧的接纳外来流动穆斯林人口。

（三）双刃之剑：宗教与组织在穆斯林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中的作用

宗教所起的缓冲、庇护所、稳定器的功能，揭示了作为整体的宗教保持移民文化连续性方面的作用。强调了宗教对移民在陌生环境中产生的精神创伤体验的心理诊疗功能。宗教组织不仅是移民群体抵御新环境中的敌意和歧视的庇护所，不仅满足移民的宗教和精神生活的需求，更为移民提供了经济与社会流动的机会，满足诸如尊重、语言学习、子女教育、求职、寻找住处等等日常实际需要。^①根据调查问卷与访谈，大部分穆斯林流动人口到达目的地后，第一个落脚点往往是清真寺或者礼拜点，阿訇成了他第一个引路人，所以如何教育、组织、管理好阿訇队伍，营造好一个和谐融洽的寺院环境，成了一个重要的工作。

另外，穆斯林流动人口进入流入地后，都有非常强烈的动力希望建立自己的群团组织，据 Mol. J. J 教授所言，移民来源地与迁入地之间的文化差距越大，移民就越倾向于建立自己的教会亦或族群组织。^②但是政府在这方面持保守的态度，因为这类穆斯林团体组织对政府来说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当则可以化解矛盾，形成缓冲地带，运用失控则成为不稳定因素的聚集地，甚至成为一股无形之中的抵抗力量。一个穆斯林礼拜点是一个非常具有组织化的科层制机构，需要政府重点把控，所以在义乌或者嘉兴，往往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组织化要求都是被寄居在各类商会名下的，如义乌比较重要的带有穆斯林性质的商会有青海商会与宁夏商会。

（四）两难处境：穆斯林流动人口本身的功利化倾向与媒体的污名化

根据 Mol. J. J 教授的迁徙理论中，在流动迁徙的决策、准备、旅途、抵达目的地、定居过程中，移民都会积极地运用宗教组织和宗教实践，从宗教中获得支持。嘉兴、义乌两地的穆斯林流动人口也或多或少有这样的功利化倾向，“在维权争取利益的时候，戴个小方帽就是穆斯林了，而平时就喝酒吃肉”，一位义乌阿訇曾气愤地对我们说。嘉兴市民宗局干部最津津乐道的便是取消民族加分后，来他办公室找他们办民族身份变更的人骤减。^③其实这种政策的改变是合适的。对同一地区民族平等，对不同地区进行区别，这是为了保证落后地区的持续性发展。因地而不是因人来采取优惠措施。还有如对穆斯林丧葬问题，穆斯林可以土葬，但是我们现在的政策，只以十大民族为判断穆斯林的标准，有点简单粗暴。据义乌一位阿訇说，有部分人虽然是十大民族之一，但是根本从来不到清真寺做礼拜，也不遵守各项宗教禁忌。但是却可以享受土葬，很多人保持了一辈子的信仰却因为不是属于这十大民族而不能获得应有的土葬待遇，他作为阿訇内心感到非常愧疚。这也从另一方面显示了部分穆斯林流动人口的功利化倾向。

另一方面是媒体对穆斯林某些问题的污名化。比如有些穆斯林餐厅因为现实利益冲突而发生的暴力事件，媒体却在报道中故意强化了其伊斯兰特性。亦或者穆斯林青年像其他种族获宗教背景的青年一样，由于家教欠缺、失业或青春期的原因实施一些违法乱纪的行为。但是这种在别的民族身上很正常的问题青年现象，在一些媒体获舆论中却成为伊斯兰教所导致，或者给群

① Hirschman. C. The Role of Religion in the Origins and Adaptation of Immigrant Group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004Vol. 38 (3), P1206 - 1233

② Mol. J. J. immigrant Absorption and Relig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971. Vol5 (I), P62-77

③ 浙江省政策：景宁畲族自治县、民族乡（镇）、民族村的少数民族考生（以户籍为准），可以在其统考成绩总分基础上加 5 分投档；散居地少数民族考生与汉族考生同等情况下优先录取，不加分。

众的感觉是穆斯林这个族群所具有的暴力特征，以此将穆斯林污名化。^①

（五）新旧交替：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独特性与新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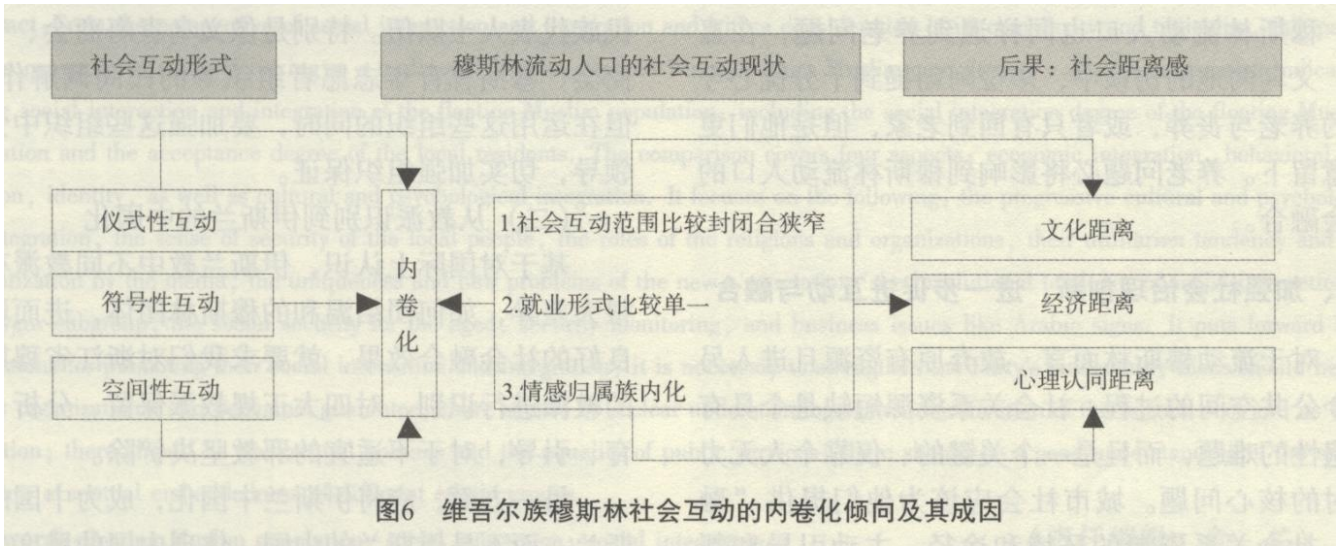
第一代穆斯林流动人口在城市的主要价值在于站稳脚跟，适应新的经济文化与社会环境，无暇顾及其它，但是新生代穆斯林有的就出生在城市，或者成长在城市，它具有了与老一辈穆斯林很多不同的精神特质与现实需求。他们除了横向移动，更要求在地位上垂直上升，他们在城市环境中形成其梦想，并想在城市里去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们维权意识更强，有一套跟父辈不一样的价值标准，他们考虑更长远的利益与发展，他们对宗教礼拜更具有个体化、离散化等倾向。以离散化为例，老一辈穆斯林都喜欢围寺而居，这主要是为了礼拜的方便，但是新生代穆斯林更愿意在自己家里，或者学校寝室进行宗教仪式，不喜欢聚集到清真寺或者礼拜点，呈现离散化特点。

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不管在义乌还是嘉兴，穆斯林家庭普遍意愿想让子女去西亚、阿拉伯或北非等国家学习语言或经学，义乌更盛，因为他们认为从那里毕业后可以更好的就业，这种盲目崇拜往往给回国后的教育带来困扰。

（六）社群之别：维吾尔族亚群体社会互动的内卷化倾向

在不同的穆斯林群体之间，也存在着互动与融合的不畅，如本地与外地的穆斯林，特别是同属于流动穆斯林群体中的回族穆斯林与维吾尔族之间，形成了鲜明的社群区隔意识。在访谈与实地调查中，义乌和嘉兴两地的回、撒拉、东乡等族穆斯林群体之间芥蒂较少，而他们和维吾尔族穆斯林群体基本上不打交道，在义乌的大清真寺，寺内专门划定了一片区域给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在访谈中，回族穆斯林也普遍表示，与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关系不如与当地居民，基本不来往，可见他们彼此之间的芥蒂之深。

另一方面，由于语言与生活习俗上的巨大差异，维吾尔族流动穆斯林的社会互动呈现一种内卷化倾向，使其更难融入当地生活（见图6）。



①访谈中一些市民感觉穆斯林会用暴力来解决问题，火气大和他们吃牛羊肉有关。

在访谈过程中我们发现维吾尔族流动穆斯林的社会互动范围比较封闭，人际交往范围主要局限在族群内部，甚至只在来自同一地区的群体内部交往。就业形势比较单一，主要以流动摊贩贩卖新疆特产、水果、切糕，烤羊肉串等。情感归属族内化，维吾尔族流动穆斯林一般不会去其他民族、包括同为穆斯林的回族人开办的餐馆工作，遇事也不大会求助于族外人。所有这一切导致了一种后果就是族内互动频繁，而族外互动衰退，此种情况加剧了其与原住民的社会距离感（文化距离、经济距离、心理认同距离）。

（七）民生忧思：民族养老、安全监控、商家阿语招牌等其它问题

民族的教育、养老等问题，是一直以来困扰政府民族政策的问题，也影响了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比较突出的问题有以下几方面，一是义乌大清真寺的安全监控问题，义乌大清真寺每周五的主麻日有 7000~8000 信众礼拜，规模可以说在华东地区是最大的，其安全问题也就成了当地民宗局的当务之急，现已在清真寺内装了监控，下一步要在门厅设置安全检查措施，从政府的目的出发，是为了安全，但是当地穆斯林群众觉得为什么佛院不装，偏偏要在清真寺装，是一种歧视，这就牵涉到了沟通与协商的问题。二是义乌各类商家标识的问题。义乌有三百多家清真餐厅，还有为数更多的杂货铺，五金店、工艺品店、灯箱店等几乎都在显著位置标识了阿拉伯文店名，再是英文店名，最后是中文店名，有的甚至连中文店名也省略了，给每一个初入义乌的人一种误入中东某国家的感觉。显然这过于区隔的标志不利于民族融合，但是当地民宗局却是有心无力。因为除了公用单位、事业单位可以强制标识，对于私营个体工商户的标识无明确规定强制各类文字的排序，而且这样的行政执法可能涉及到工商、城管等多个部门，无法由民宗局来实现。三是民族养老问题，中国已普遍进入老龄化社会，穆斯林流动人口也同样遇到养老问题，在嘉兴、义乌两地的访谈中，多位阿訇提到十分忧心今后的养老与丧葬，或者只有回到老家，但是他们更愿意留下。养老问题必将影响到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六、加强社会治理创新，进一步促进互动与融合

对于流动穆斯林而言，放弃原有资源且进入另一个公共空间的过程，社会关系资源短缺是个具有普遍性的难题，而且是一个关键的、仅靠个人无力应对的核心问题。城市社会应该为他们提供“融人”社会关系资源的环境和途径，主动引导和帮助他们适应城市社会，这样才比较符合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承诺与发展趋势。将重建社会网络与积累“社会资本”作为支持流动穆斯林人口适应城市社会的充分条件也是合适的，对流动者与城市社会都是如此。

（一）加强党的领导，提升组织保障与人员配备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最大的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我们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所谓全面领导就是“党政军民学，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故此在推进整个民族治理创新，有效加强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社会互动与融合方面，也要紧紧依靠党的领导，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在维护党的权威基础上，集中统一领导。具体可以有以下一些做法：第一、可以选派一些熟悉宗教民族事务，并有这方面工作经验的西部干部到东部来挂职，帮助沿海城市来处理好激增的宗教事务。一方面他们更有经验，另一方面有利于沟通协调，在流动人口流入地与流出地建立起有效的沟通机制，将会有非常深刻的作用。第二、探索如何加强对民管会、寺管会监督、指导的体制机制，对其更有效的管理。形成民管会、礼拜点负责人阿訇、普通穆斯林群众三级的管理体制，充分掌握信息。第三、继续推进网格化管理，依托社会综合治理“一张网”工作体系，建立穆斯林服务与管理网格。每个网格都配备网格长与网格员，并明确网格长和网格员的工作职责，实现工作对象在网格、服务内容在网格、管理事务在网格、问题解决在网格，为开展城市穆斯林工作提供平台保障。第四、有效发挥民间团体的柔性治理作用，不断壮大少数民族代表人士队伍。特别是像义乌青海商会、宁夏商会、穆斯林青年志愿者组织等的民间调解作用。但在运用这些组织的同时，要加强这些组织中党的领导，切实加强组织保证。

（二）从教派识别到伊斯兰的中国化

基于对国际上认识，伊斯兰教中不同教派存在很大差异，如何团结温和的穆斯林团体，进而取得良好的社会融合效果，就要求我们对浙江省穆斯林的教派进行识别，对四大正规教派保留、分析、教育、引导，对于不适宜的邪教坚决铲除。

另一方面，应将伊斯兰中国化，成为中国的伊斯兰，而不是伊斯兰的中国，体现中国的风度与姿态。这样才能更有效地促进穆斯林的社会融合，形成美美与共的局面，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具体做法有，第一、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清真寺形制，清真寺的外形从符号学上来说就是一种象征。古代中国的伊斯兰教清真寺，都是中国式的建筑，但是现在却变成了中东的主流建制，未必要盲从，应该要有中国特色。西安化觉巷清真大寺、嘉兴的清真大寺都保留了极富中国传统建筑的风格，值得借鉴。第二、举办伊斯兰学术巡回展，展示真正中国主流伊斯兰学者的思想，增进普通大众对伊斯兰教及穆斯林的理解。让大家了解伊斯兰文化中那些向善、卫生、和平的观点，并形成中国的风格。

（三）从优惠政策到公共服务均等化

优惠政策对穆斯林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无需感恩戴德，在他们心理融入中没有显著影响。这也从侧面说明，对于穆斯林流动人口的服务，不在于制定什么特殊优惠政策，而在于以提供平等、公平的公共服务为原则，促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服务均等化，实现“民族平等，一视同仁”这反而更有利于新一代穆斯林的心理融入。毕竟，只有弱者才需要照顾和优惠，平等公平才有利于自尊自立的人格培养。

（四）对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的冷思考

各地都在建设各族群众嵌入式居住、嵌入式社区环境等工作，但这些工作不应该是简单机械的嵌入，而必须是要有载体、有活动、有组织，有人员的建设，并且是根据当地社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分类开展的。现代国家总是倾向于让社会更加清晰、重新安排人口以便更容易行使古典的国家职能以及改善社会生活，满足对表面秩序、表面清晰的美学偏好。清晰性和简单化是国家机器的中心问题。^①国家为此实施各种大型社会工程项目，包括对人口和生产作“驯化的尝试”，可是由于以下四个因素的致命结合，这种“人工设计社会秩序的帝国主义”往往带来巨大灾难。这四个因素是：国家的历史比社会要短，对社会很多关键方面所知甚少，却简单化地重塑社会，而且其兴趣只在很少几个目标上；强烈信奉极端化的现代化意识形态；采取独裁专权；软弱的公民社会无力反抗。^②

所以在建设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时，应该更多的考虑其复杂性与多样性，更具不同社区的形制分类建设，在建设过程中应该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进社区，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联谊活动，引导各族群众深化日常交往，激发认同感，增进凝聚力，实现各民族的思想嵌入、文化认同嵌入，使嵌入式社区成为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有效载体。形成结邻而居、守望相助的新常态。

① [美]詹姆斯·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② 毛丹等：《J市农民为什么不愿做市民——城郊农民的安全经济学》，《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6期。